

· 周纯麟



征途的 回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周 纯 麟

征 途 的 回 忆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文字整理：陈识金

责任编辑：杨 杰

封面设计：速泰熙

征途的回忆

周 纯 麟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门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25 插页2 字数76,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1100·144 定价：0.65元

前 言

一九七九年底，舍生救过我的老战友姚运良同志临终前，曾对我提出两条要求：一条是在他死后，要我对他的孩子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经常教育，严格要求，使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为党和人民作出一点贡献；一条是他要把曾玉良烈士牺牲的消息告诉他的亲人。红军时期，姚运良同志、曾玉良同志和我一道当通信员时，曾经有过诺言：如果我们三个人中哪个人先死了，后死者要把先死者的情况，告诉他的老家。曾玉良同志牺牲后，姚运良同志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都没有打听到曾玉良老家的人，因此，也没有能将曾为革命牺牲的情况告诉曾的亲人。所以，姚运良同志在临终前对这件事非常遗憾，再三对我说：“请你无论如何放在心上，为曾玉良完成这件事，把他牺牲的情况，告诉他家里……”。

一个人的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莫过于在他临死的时候，还想到党的利益，想到革命的事业，想到战友和同志的嘱托！

起先，我并不知道曾玉良同志已经牺牲。后来华北骑兵团南下，与我们会师于曹市集时，我才知道了曾玉良同志牺牲的消息。他是在抗日战争中打鬼子时，英勇作战，牺牲在山东省曹县的。当时，曹县人民为纪念曾玉良同志，曾一度把县名改为“玉良县”。全国大陆解放以后，我也曾多次写信到曾玉良同志的家乡——河南省固始县，打听询问曾玉良同志家庭的具体地址和情况。然而，都是查无下落。这次，姚运良同志临死之前，又将这

战友的重托，再次托付于我，我怎么不感到担子的繁重呢？！我抓紧打听曾玉良同志家庭的信息，写过很多信，问了许多人，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收到了河南省固始县民政局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曾玉良烈士系我县祖师公社杨松大队人。自幼母亡，家庭贫困，九岁就给别人放牛谋生，洗衣补裳由姐姐照料，十七岁时参加红军。……曾玉良烈士，在一九八〇年已编入《烈士英名录》光辉史册。”读完了这封信，我高兴得老泪纵横，姚运良同志病逝前的重托终于完成了一个。

然而，姚运良同志托付给我的第二个任务，却使我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的子女住在合肥，离我较远，我们偶尔相见，也不可能多谈。同时，思想教育是个长期的任务，它不是靠一两次谈话就能奏效的。而我自己又到了古稀之年，能够与年轻人交谈的时间和机会也已很有限的了。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最好的办法是将过去的战斗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代。让我们的子孙从中了解他们的革命前辈，曾以多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浴血奋战，历尽艰辛，从而激励他们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努力奋斗。

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政治理论编辑室的同志的热情关心，大力支持，悉心指导。因此，这本回忆录才能有幸问世，以告慰先烈。

作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前言	1
一、我的第一个班长	1
二、参加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	6
三、四次见到徐总指挥	8
四、新来的政委	19
五、第四次反“围剿”片断	25
六、夜袭狮姑顶	30
七、难忘的情景	38
八、我永远怀念的通信员	40
九、“小诸葛”	44
十、一个烈士的遗愿	48
十一、战士的风格	52
十二、回到党的怀抱	58
十三、在友军中	67
十四、狱中斗争	79
十五、周副主席视察野营地	92
十六、延安行	94

一、我的第一个班长

我的老家，在当年湖北黄麻起义地之一的麻城县。黄麻起义之后，麻城县苏维埃政府动员青年踊跃当红军，当时我是赤卫队员，又是共青团员，扩军一开始，我就在区苏维埃里抢先报了名。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我在红军补充团里参加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和第十五军在商城南面的长竹园会合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就在这年的一月下旬，我从红军补充团调入了正规部队。因此，我当红军的第一个连队，就是刚刚合编的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七连。

我们连队的指导员，是河南人，他二十一二岁，读过书，有文化，也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一到连队，他就找我谈话，问我家里有几口人？父母身体怎么样？分到田没有？为什么要当红军？……就在谈话的时候，随着一声“报告！”门口出现了一个约摸二十三四岁的战士。他个子不高，却长得很结实。李指导员高兴地站起来向我介绍：“这就是你们四班的胡班长。”接着，他又把我向胡班长介绍：“这就是你们班新来的战士周纯麟。”

胡班长微微一笑，把我的右手紧紧地握在他的一双大手之中，却并没有讲什么话。就这样，我便成了他的部下了。

到连队的那一天，正下着大雪，还刮着西北风，天冷得象能够把石头冻破似的。我们虽然住在一间房子里，但是房子的四壁上到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窗子，西北风呼呼地从窗子里钻进来，有时还

带进一些寒飕飕的雪花。当时，我身上穿的还是那件从家里带出来的短破棉袄，又没有棉裤，连床被子也没有。靠着破棉袄，白天活动活动还勉强能够坚持过去，可是到了晚上，就难受了。老同志也没有棉被，每人只有一条布单子。夜里，为了御寒，大家只好在房子中间燃起一堆柴火，在弥漫着呛人的烟雾下面，各人裹着单子，围着柴火睡觉。一会儿朝里，一会儿朝外，烤热了这半个身体，再翻过身来烤另外半边。

我是个新兵，没有烤火睡觉的经验，所以头天晚上在火堆旁边烤了一阵以后，便随便在门口找了一块地方准备睡觉。当我理理稻草刚要躺下的时候，班长突然叫住了我，他指着火堆旁边一个圆簸箕，要我睡在那里边。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正在犹豫，他跑过来一把将我拉了过去，告诉我说：“这里靠火近，暖和一些。”说着从自己的包袱里掏出单子，裹在我的身上。我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看出了这簸箕原先是他睡的，可是要想推让已经来不及了。

等大家都睡好之后，他又在房子四周转了一圈，然后转过身来，往火堆上加了一些树枝，这才悄悄地躺在我刚才要躺的地方。

这是我来到四班的第一个夜晚。这一天晚上，我好久没有入睡，侧着身子，背靠着火堆，借着一闪一闪的火光，长久地凝视着班长曲卷着的身体，心里老是寻思着：“这是多好的班长啊！”

我那时革命道理懂得很少，还有些小孩子脾气。在家时，我虽然跟着哥哥周纯麒，为赤卫队员放过哨，送过信，卖过豆腐，但毕竟很少出远门，到连队以后人既生疏，说话又不懂，所以有时未免流露出想家的情绪。胡班长说话嗓音很粗，但是心却很细，班里同志的心思，虽说了如指掌，可也琢磨得差不多。所以，每当我一不高兴，很快就能被他看出来，把我拉到一边，细声细语地和我谈心，告诉我许多革命道理。他给我讲了许多他们家乡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有时也讲一些他自己家里的悲惨遭遇。胡班长他平时不大爱讲话，一讲到这些事情，就往往激动得更加说不出话来。可是我

仍然很喜欢听着他讲。他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参军以后的第一个直接首长，也是培养和教育我的第一位老师。

那时候，几乎每天夜里都要行军，而且一走就是几十里。班长怕我们几位新同志走不动，往往是在全班的后面走，一路上总是替我们扛枪、背东西。我不大会走泥泞路，他便把自己的脚马子脱下来让给我穿。这种脚马子，实际上是一种绑在脚底下的鞋襻子，不怕泥泞、路滑，掉不了鞋子，就象汽车上的防滑链条一样。他还教我行军时尽量在草地上走，有时他还扶着我走。到目的地以后，他便马上把洗脚水烧好，端到我们面前，叫我们休息，由他和几个老同志轮流站岗。常在经过再三要求后，他才勉强答应我们参加放哨。他常常跟我讲如何放好哨的事：白天怎么放？夜间怎么放？风雨天怎么放？霜雪天怎么放？连部、营部门口怎么放？在哨位上遇到首长怎样敬礼？应该注意什么征候？遇到情况怎样处理等。

我到连队一个多月就过春节了。

除夕那天晚上，炊事房里给大家做了好几样菜，有粉丝、豆腐、白菜……还有鸡子和猪肉。吃除夕饭的时候，班长不住地招呼大家：“同志们！今天过年了，吃吧！”大家愈吃愈乐，班长看着大家，也显得格外高兴。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李鸣钟，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采用“追堵兼施”战术，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因此，过春节不久，我们就向北开往河南的光山、潢川一带待命。我们从湖北的洗手盆出发，接连走了六七天，一天晚上，部队在潢川亚江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下来。第二天清早，我和几个同志到附近一个村子的地主家去背柴禾，刚出地主门，西边“叭叭”响起了枪声。我们一听不对，把柴禾一丢，拔腿就往西跑，一到驻地，立即就随部队向西出击。

走出村子不多远，便和敌人碰上了。这股敌人是从北亚江圩

子出来的，他们听说我们来了，想趁下雪天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在敌人火力压制之下，部队在一片开阔地上停了下来，四周是一片水稻田，除了几个坟包以外，其余的地形都不好利用。这时，敌人的机枪、步枪象下雨似的朝我们直扫，子弹在我们前后乱窜。班长命令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迅速隐蔽到坟包后面，而他自己则伏在我旁边的平地上。

枪声愈来愈紧，还隐约听到敌人在对面喊叫的声音。那时候，我还不会利用地形、地物。当我正跪在坟包上朝前看时，班长猛地转过身来，一把将我拉倒，接着“叭”的一声，一颗子弹就打在我的脚跟后面。我伸了伸舌头，扭过脸去看看班长，只见他仍然静静地伏在旁边，右手紧紧地握着一颗手榴弹。

敌人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了。顷刻之间，我们的步枪叫了起来，我们的手榴弹飞了出去。一阵猛打，把敌人的第一次攻击打下去了。后来敌人又组织了几次冲锋，但是也都被我们打了回去。每次敌人冲锋前后，班长总要嘱咐我们注意监视敌人和隐蔽自己。当敌人组织最后一次攻击的时候，我们的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于是，班长叫大家上好刺刀，准备冲锋。等敌人靠近之后，班长首先跳起来，端着刺刀，一个箭步冲到敌人面前，照准敌人劈头就刺，我们也跟着一齐反扑上去。这时，八连和九连也从两边插上来了。敌人见势不好，掉过屁股就往回溜。

营部和连部随即吹起了急促的冲锋号。班长一声“冲呀”提着步枪往西追去。我们也跟在后面逢水过水，逢沟过沟，一气追了好几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一只鞋子被陷在稻田的烂泥里了，脚底磨在冰块和冷得象石头一样的泥块上，皮破血流……我忍着脚上的伤痛，咬着牙齿，一步不拉地跟在班长后面，班长也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我。当他发现我光着一只脚时，连忙问我：“鞋子呢？”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立即要我停下，同时急速地脱下自己脚上的一只鞋子，扔到我的跟前，命令似地说：“赶快穿上，跟上队伍！”就又

继续向前了。

等我穿好了鞋子,已经看不见班长。于是,我就随着其他连队向西追去,一直赶到北亚江圩子外边。在途中,我还抓到了一个俘虏,缴到了一支大鼻子步枪和两子弹带子的子弹。

回来的路上,我扛着新缴来的步枪,回忆着刚才缴枪的情况,心里觉得美滋滋的。我跨进我们班的驻房,只见屋子里两个同志埋着头在一声不响地擦枪。

“班长呢?”我问他们。他们两个好象都没有听到我的问话似的,谁也没有吭声。我意识到似乎出了什么岔子,不敢再问下去。

沉默了很久,一个同志才以低沉的声音告诉我说:“胡班长在追击敌人中,在北亚江圩子跟前牺牲了。”

我慢慢低下头来,望着脚上的鞋子,眼泪止不住一下涌了出来。

.....

后来四班又补充到十二个人,我被任命为副班长。新来的同志们虽然没有见过班长和其他几个烈士,可是每次战斗之前,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些先烈的名字和事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清楚:我们肩上担负着班长和烈士们未完成的事业,必须继续和敌人作战!

二、参加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

一九三一年秋，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抗日。

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了。我为自己能参加这个成立大会而永远感到自豪。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是一九三一年十月七日在黄安县正北的一个不小的集镇——七里坪召开的。那天，七里坪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主要街道“列宁街”格外热闹。居民的屋墙上、店铺的门板上、路口的树干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标语。成立大会会场设在西门外的倒水河河滩上。那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部队武装整齐，精神抖擞，接受方面军首长的检阅；周围的田埂上、山坡上聚拢着无数前来庆贺的群众。为什么选择十一月七日在七里坪集会？一是为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二是为了庆祝黄麻起义，因为七里坪是当年黄麻起义攻打黄安的出发地。会上，鄂豫皖中央分局正式宣布，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成立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任政治委员，随时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一个

新的阶段。它是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喜事。我站在整齐的队列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拍红了手掌，喊哑了嗓子，仍不愿休息。同志们完全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之中。

方面军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兵力近三万人。原四军所辖的十师、十一师和十二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我仍在十一师三十三团七连四班当副班长。我们十一师的师长是王树声同志，政委是甘济时同志。

此时，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虽未开始，但已重兵云集，呈箭在弦上之势。方面军总部一直密切注视着敌人的部署变动和增兵活动，并积极开展外线进攻。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的八个月时间里，方面军连续进行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

三、四次见到徐总指挥

战争年代,虽然官兵关系很融洽,但是一个普通战士,要想在战事频繁的情况下,越过自己的连、营、团、师、军等多级领导,见到方面军的总指挥,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由于担任了通信员和通信排长的缘故,在一九三二年春到一九三三年六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却先后四次见到了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而且每一次相见,徐总指挥都给我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见徐总指挥,是我到师部当通信员不久的事情。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也就是商(城)潢(川)战役结束后,由于战场形势的需要,我从三十三团调到红十一师师部当通信员。师部通信排也扩大成了通信队。我当通信员没几天,就赶上红四方面军发起的第三战役——攻打苏家埠。这次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我军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枪两万多支、炮四十三门、电台四部,击落敌机一架,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一次空前大胜利。我们红十一师在这次战役中,也打了个大胜仗,捉了许多俘虏,其中有十六个敌人的师、旅、团级军官。一天早上,倪志亮师长要我们通信班把俘虏的一批敌军官押送到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去。

当时,我们住在韩摆渡北面的一个村子里,方面军指挥部住在戚家桥南边的一个庄子里,当中相距十多里路。吃过早饭,我们班六个人,就在单玉(外号叫鱔鱼)副班长的带领下,押着俘获的敌军

官出发了。

那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我们怕俘虏逃跑，六个人作了分工：一个人在前带路，两个人在中间监视，其余三个人全在后面。当时我们六个人带的都是匣子枪，子弹都上了膛。

被俘的敌军官大都很胖，穿着黑呢子大衣，有几个负了轻伤。由于道路难走，他们都跑得头上冒汗。

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到了方面军指挥部所在地。指挥部设在当地一个大地主的家里。这个圩子周围有水沟，只有一个大门能进圩子。圩子里是四合院的瓦房。我们让俘虏停在圩子里的一块空地上后，单玉就进去报告了。

不一会，四合院左边的一间屋子里走出一位三十多岁样子、身材魁梧的军人。他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披着一件黑呢子大衣，打着灰色的绑腿，显得英俊而又潇洒。当我正在暗自揣摩这位军人是谁的时候，老通信员小华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徐总指挥！”

“啊！他就是徐向前总指挥吗？”我又惊讶地问了一句。

“是的！”小华点了点头。

就在我和小华小声交谈的时候，徐总指挥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立即向他敬了个军礼。

他问我们：“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单玉回答：“我们是十一师的。”徐总指挥指了指停在空地上的俘虏，问我们：“他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告诉徐总指挥：“他们有的是我们昨天在打援兵战斗中俘获的，有的是在战斗中投降的。”

这时候，徐总指挥就对俘虏们风趣地说：“前几天叫你们投降，你们总想等援兵来会合，这一下，你们可真的会合了！”

徐总指挥的这几句话，把被俘的敌军官一个个羞得低下头，连大气也不敢出。

接着，徐总指挥又对敌军官们说：“你们总希望有援兵来救你

们,不是来过三次吗?……可是你们最后还是投降了。”

徐总指挥略停了一会,就转过身来问我们:“你们师里对俘虏怎么样?”

单玉回答说:“师首长已经分配人去做工作了。”

徐总指挥对我们说:“你们要按我军俘虏政策办事,不要打骂俘虏,给他们吃饱。但是,现在要注意,不要煮干饭给他们吃,因为他们都饿急了,肚子是空的,肠子饿细了,要先烧点稀饭,让他们吃几顿稀饭适应一下,然后再慢慢吃干饭。”

徐总指挥给我们讲了有关对待俘虏的政策。他举了一个实例对我们说,有个俘虏,被我们俘获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给他钱,让他回家,结果他又到国民党那里去当了兵,以后和我们红军一接触,又过来了。我们把他放了后,前几天,他又被我们俘虏了,一见面,他就要我们的战士闻一闻他的枪口,表示他没有放过一枪,身上的子弹袋子是满的,说明他领了多少,还是多少。徐总指挥说:“这件事,说明我们的俘虏政策好啊!希望大家按照我军的俘虏政策办事!”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徐总指挥又转过脸去问敌军官:“你们的東西,他们动了没有?”俘虏们一边说“没有”,一边把他们身上的挂表、钢笔、手电筒等东西拿出来给徐总指挥看。

徐总指挥很高兴,豪迈地对被俘的敌军官说:“我们的战士比你们懂事得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他们会优待你们的。”

不一会,徐总指挥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回去之后,对倪师长、甘政委说,要好好优待俘虏。俘虏中的伤员,如果他们愿意回家,就放他们回家;如果他们愿意到我们后方医院去治病,也行!”

我们临走的时候,徐总指挥问我们:“你们到参谋处打收条没有?”我们告诉他,参谋主任已经给我们打过收条。

我们集体向徐总指挥敬了个军礼,就高兴地返回师部去了。

到师部之后,我们向倪师长作了汇报。师首长遵照徐总指挥

的指示，让师部学兵连的一百多名同志，穿得整整齐齐，每人一把刀，一顶竹笠、一支步马枪，列队站在路的两旁，敲着锣鼓，欢送愿意回家的俘虏回家。有的俘虏在领取了我们发给的两块钢洋后，感动得流了眼泪，表示“再也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

送完俘虏归来，我们就随同部队西进豫南，参加方面军发起的第四个战役——潢(川)光(山)战役。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战役发起。我们十一师按照方面军首长的命令，连续行了几天军，才秘密插到光山以北、潢川以南的璞塔集。

潢光战役，前后只用了五天时间，我军就歼灭了敌人正规军八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收复了被侵占的地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威震鄂豫皖的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即被我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方面军已组成两个军六个师，还建立了四个独立团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四万五千多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第二次见到徐总指挥，是在我军西行转战的途中。西行转战，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首长在优势敌人拚命围追堵截的逆境下，被迫实行的长途战略转移。准备第一步西越平汉路，转到鄂豫边蹲一蹲，然后伺机再杀“回马枪”，转回鄂豫皖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晚，我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突破敌两个师的防线，西越平汉路，在枣阳新集打了一次极为凶恶的反击战，才化险为夷，到达陕南与河南的交界处——商州。

那时候，天天都要行军、打仗，鞋费得很厉害。每到一地，都要